

■第一阅读

中华“父亲山”的孤独歌者

——评新版《山祭》《水葬》

□李 星



业并举的措施,改善了村民生活。然而冬花却因受伤害太深而与之决绝,毅然与心地善良的残疾人庞章得结婚。在《水葬》中虽然没有宋土改之类的忏悔者形象,但它却写了几个原本正派,甚至曾经豪侠仗义的农民或因为妒忌、或因为爱情而在“文革”中为恶,并在后来改邪归正的主要人物形象,不仅表现了无休无止的山村政治运动对人性的扭曲,而且表现了极左年代历史和人性的真实,山村人与人关系的复杂多样。

王蓬是因父亲的历史冤案在少年时随全家从西安被贬到秦岭深山的,并因政审不合格而失去升学机会,穷困与屈辱可以想见,然而从小说中可以看出,他记住的不仅有社会大背景下人性的丑陋,更有即使大潮流中为恶者心灵深处原本的善良和纠结。这种内在的清醒和文本质素,使《山祭》和《水葬》对极左年代历史的谬误和人性的之恶,有一种通达宽容的理解和深刻,不仅直面外在社会历史的真实,更有内在的灵魂反省和对人性的肯定。这种实事求是的宽容立场不仅在当时的文学中十分罕见,在今天更应该成为历史反思文学共同的精神质地和胸襟怀抱。

其次,王蓬的长篇《山祭》以宽阔的视野展示了秦岭南麓这块神秘大地在中华文明中光荣的历史地位及在中国近现代历史潮流中复杂的政治、经济、文化处境和民众真实的生存状态。早在战国时期这里就成为秦楚两国互争之地,

既是秦头,又是楚尾。这里有萧何月下追韩信和汉王刘邦的“拜将台”遗迹,又是褒斜道与子午道的最南端,曹操等人在这里留下了汉魏书法经典“龙门十三品”,诸葛亮在此屯兵并出击关中,发明了木牛流马,张良在这里归山,张鲁先在这里创建“五斗米”教。但是到了近现代这里奇密茂险的山林环境,又成了无视官兵存在的土匪的天下,兵匪勾结,勒索无尽。直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几年,这里的土匪才被彻底剿灭。但是自然的严酷,人口构成的复杂和居住的分散,在改革开放以前,特别是极左路线影响之下这里还存留着“刀耕火种”的生产方式。正是这种生产和生存方式,形成了这里民间自叙式的婚姻风俗,“一妻多夫,招夫养夫,站门汉,拉帮套”随处可见。《山祭》《水葬》中几个主要人物的家庭都是这样关系复杂的组合。姚子怀的人生历史就是因为这样而复杂,任成义就是因此与所爱的女人分开。然而读者从这里看到的不只是丑陋和人们的苦难,更多的是艰难生存状态下古朴善良的道德,包容而宽厚的人情以及独特的民俗风情。如“打山子”、“交口”、“吃刨堂”这样风险共担、收获共享的生产生活方式,如即兴出口的锣鼓山歌是那样声情并茂,猎熊、打山猪等惊险刺激的狩猎场面都充分表现了劳动者的勇敢和智慧,山民们的顽强与乐观。

《山祭》和《水葬》是最为雄浑、壮

农村,是在清贫和困苦条件下产生出来的,是昭通生活在最基层、最底层群众生产生活和喜、怒、哀、乐的写照。如果从更深一层看,我们不难发现,这些作品充满了对底层弱者的同情悲悯,对复杂人性的深入解剖,对社会现实的深刻反映。昭通作家贴着昭通这块大地行走,大多数作家来自于基层、来自于农村,来自于各行各业,对时代的发展变化有着强烈的忧患意识,对昭通有着深厚的感情,对590多万昭通人民的喜怒哀乐、悲欢离合有着切肤之爱 and 切肤之痛。作家坚持深入基层、深入生活,以高昂的激情、生动的笔触,用文学记录发展、凝聚力量、鼓舞人心,用文学反映变化。正因为如此,他们创作的大多数作品,让人读来非常震撼,非常感人。

当然,凡事都有两面性。昭通作家群、昭通文学现象盛名之下,还存在哪些缺陷?昭通这块丰饶的文学沃土,还存在哪些危机?在昭通文学向更高目标前行的道路上,还存在哪些瓶颈?所有这些,我相信,是每个真正热爱昭通文学、关心昭通文学发展的同仁特别希望了解的。正因为这样,我们也特别需要一部总结昭通文学成就和经验,研究昭通作家作品,梳理昭通文学史发展脉络,查找昭通文学存在问题和不足的专门著作。来为我们过往30多年的昭通文学岁月,雕琢下真实深刻的年轮。

《昭通文学30年》恰逢此时出版问世。我因工作之便,先睹为快。我看到,这部著作,从一份问卷、一部作品、一个作家人手,从一个细节、一个事件、一个现象开始,深入地细致地回到文学历史,回到文学现场,全面生动地展示了30多年来昭通文学的发展过程、突出成就、典型案例、文体概貌、重要作家作品、基本经验规律。如此纲目清楚、详略得体的地方文学写史立传,在云南,这还是第一例。一方面,说明昭通文学实绩确实值得书写;另一方面,也说明本书写作者目光敏锐,敬业勤奋。在此,我要以一个作家的身份,向他们表达真诚的谢意和致敬!

多年前我与本书主编冉隆中就有关以文会友交往。我的拙著《香格里拉——远古的呼唤》出版后,冉隆中即给予非常专业的中肯批评。为此,我们有过书信交流切磋,彼此引为文友。这样有古风的君子之交,连一杯清茶也免了,却是古人所谓同声相应、同气相求。用今天的话说,叫精神取暖。我特别提倡,置身昭通作家群体中的诸位,同道之间要团结、关爱、互相欣赏,读彼此的作品,真诚善意地相互批评和自我批评,并勇于接受那些真正关心昭通文学成长进步的尖锐批评。我们要更关注当下,脚踏实地,进一步补充生活。优秀的作品来自扎实的生活。在扎实生活的基础上,磨练自己的文字功夫。我坚信,中国文学对昭通作家一定充满着更高的期待。

《昭通文学30年》,冉隆中主编,云南人民出版社2013年9月出版)

值得书写的昭通文学实绩

□刘建华

我对昭通文学的欣赏和关注,可谓久矣!这种欣赏和关注,并非来昭通履职之后,而是在很久以前。

少年时,我也有一个文学梦。从爱读小说到尝试小说创作,文学,一直伴随着我的风雨人生。阅读文学,让我心灵得以不断滋养;文学创作,让我反复咀嚼提炼过往人生;发表作品,让我内心体味收获的喜悦快乐……

尽管事业选择和社会需要使我最终并未走上职业创作之路,但是,我与文学从来都是相依相伴,不离不弃。至今我还记得,很多年前,我去雪域高原迪庆藏区履新,行前,我做的重要案头工作之一,是阅读詹姆斯·希尔顿所著长篇小说《消失的地平线》。平时我会利用工作之余的碎片时间,阅读包括文学在内的各种书籍,借以为自己充电加油。我没有专门写作的整块时间,只能像挤牙膏一样一点一点挤时间,记下灵光火石般闪过的一两句警句格言。就这样,居然也在省级和国家级文学刊物上,陆续发表了一定数量的小说和散文,也收获了各种文学奖项,有的作品还被各种选本或文学年鉴收选,或被改编为影视作品。我的小说和散文得以正式出版,有的还一版再版,受到读者和专家好评高看,并因此成为中国作家协会的一名会员。

昭通文学早就进入了我的阅读视野,是因为昭通文学名声在外。我不仅读鲁奖获得者夏天敏的小说、雷平阳的诗歌,也喜欢樊志慰抒写的瑰丽想象、陈衍强素描的农村娃儿;还爱看曾令云描绘的历史长卷、邹长铭冷峻的借古喻今……我虽然不能在此一一罗列我读过的所有昭通作家的作品,但是可以说,正是这些文学作品,让我提前深入到昭通的历史和现实,提前探访了昭通的世道人心,昭通文学为我提供的工作借鉴和生活补益,远非是一篇短文所能说清的。

昭通文学给我印象最强烈的有两点:一是昭通作家敢爱敢恨,感情强烈执著。诗人樊志慰打了一个比方:每一粒沙,都是溺水的水。而雷平阳则直抒胸臆:其他乡我都不爱——我的爱狭隘、偏执/像针尖上的蜂蜜//假如有一天我再不能继续下去/我会只爱我的亲人——/这逐渐缩小的过程//耗尽了我的青春和悲悯。这是诗人表达爱恨的特殊方式。小说表达作家的爱恨,则委婉得多,比如夏天敏的《好大一对手》,德山老汉因贫得以帮扶,官僚主义和形式主义却让好心变成坏事,德山老汉一家因此陷入更深的苦难贫困。夏天敏的爱恨情仇,就在细节和场景、人物和故事中自然而然地流露了出来,从而让人受到巨大的感染和警醒。昭通作家在作品中所表达的爱与恨,让我想起艾青那句诗:为什么我的眼里常含泪水,因为我对这土地爱得深沉!

二是昭通作家有对复杂现实深入叩问、对复杂人性深刻解剖的勇气和能力。如果表面地看,昭通作家大量的描写苦难贫困的作品。这些作品,大多数题材来自于基层、来自于

■书斋札记

——写在《无边的风月》之后
□王彬

自去年初,我开始撰写这本小书,截止到现在7月,在一年半的时间里,断断续续写了46篇,加上过去撰写的4篇,合计50篇,总题曰:《无边的风月》。虽然还有些题目可作,但关于红楼细部的文化——我所知道的已然大体说清,何妨以不了了之呢?

书中的文章大部分在《文艺报》,小部分在《光明日报》上以专栏形式刊载,在此向有关编家表示感谢。友人曾经问我,为什么这本小书要以《无边的风月》为名,我回答说《红楼梦》在第一回,介绍此书传播时曾经多次易名,其中之一是《风月宝鉴》,也就是说,《红楼梦》还有一个与“风月”相关的名字,《红楼梦》是说不尽的,故此便衍生了这个书名。而说到《风月宝鉴》自然会令人想到瑞大叔——贾瑞,那样一个不可挽救的蠢物,也有一面镜子,镜把上镌着“风月宝鉴”四字,跛道人说这是“警幻仙子所制”,专治“邪思妄动之症,有济世保生之功”。虽然有“济世保生之功”,却哪里想到反把瑞大叔害死了,这真是难以说清。而中国当下小说鲜见经典,原因也是复杂的,难以说清,但原因之一,或者就在这里。

扶头雾雨催春尽,十日游花尚嫩。东风一夜损芳菲,满地落红深几许?花朵是娇嫩、短暂的,春夜的东风便可以将它们吹落。花朵的生长、陨灭与文学近似,而研究者的工作便是对这一过程进行分析,至少将散落于泥土的花朵集纳起来,看看这花朵的色泽,数数这花瓣的数量,所谓细数落花,花蕊是浅金还是蔚蓝,等等,这样的事情做多了难免自己也会感到琐碎,然而既然厕身于此,总要做好,自己是不愿意只说些思潮性的笼而统之的话的。

二

说到莎士比亚,西方人有一句口头禅,叫做说不尽的莎士比亚。套用这句话,曹雪芹笔下的《红楼梦》也是如此。立场不同,阶层不同,对《红楼梦》的阐释也不同。有人说是朝代更迭时期的民族斗争,有人说是清宫内讧反映于贾姓家族,还有人说是阶级斗争,或者贾宝玉就是曹雪芹在虚拟世界里的元神,如此等等,犹如小孩子手里的万花筒,随着手的转动而呈现不同的瑰丽景象。

我没有这个能力,只能就《红楼梦》的某些细部文化,略谈我的一些拙见。比如,宝玉与黛玉第一次见面之时,宝玉为什么要穿那样的炫耀,梳那样的辮子;宝钗的围房为什么是雪洞一般,悬挂青色帐幔;金钏儿为什么在端午期间跳井,

浴火重生的《大家》

□宋家宏



后”、“80后”。先锋性是《大家》的一个传统,当年《大家》曾吹响了先锋作家的集结号,一时成为“黑马”,使边地新刊跃居名刊之列。先锋总与青年融为一体,谁拥有了青年作家谁就拥有了文学的读者。今天的《大家》又吹响了青年作家的集结号,对“70后”、“80后”来说,他们已经不是文学的未来,而是当下,是现在。因此,这个专号是非常及时的。我以为,若本期刊物以两期的面目出现,一期“70后”,一期“80后”,也许效果更佳。

第五期《大家》有一个显著的特色,即评论占了相当的篇幅,张莉的《“70后”、“80后”新锐作家创作综论》是一篇宏观性的评论,写作这样的文章有相当的难度,但这篇文章注定已经成为文学研究史绕不过去的存在,它也是普通读者或文学评论家要了解这两个作家群体的必读作品。也许,《大家》所发的一些文学作品会时过境迁随风飘散,但相信张莉这篇评论不会。作者非常及时而完整地梳理了这两个群体的面貌特征以及代表作家,以同代人的身份又准确地对他们作出了自己的判断。这样的文章绝非即兴之作,而是建立

细数花落知多少

——写在《无边的风月》之后

□王彬

便格外艰难。当然,说干到万,还是我的知识有限,需要继续努力,倘有疏讹,尚祈顾曲。

我是做文学研究的,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文化进入文学领域,从事文学的人基本转至文化领域,进行与国家、社会、群体相关的文化研究了。而文学与文化,尤其是与经典小说中细部的文化关系,则鲜有研究。这真的是一件叫人十分无奈之事,在商品经济时代,有多少人愿意做这样投入多而产出少的事呢?但总要有人去做,在细读之中发现文化,并进行某种意义的诠释,使今之读者在复原的语境中,得到某种感悟,进而领略蕴藏于其中的奥妙与意义,难道不是一件应该努力去做的事情吗?

英国人喜欢说这样一句话:One hand washes the other,大意是,两只手相互清洗,才可以清洗干净。在一个与读者互动的时代,当然也是如此。即因此,本书采取了随笔形式;同时根据《红楼梦》的回目顺序进行编辑,而使读者可以大体对应。这当然是我个人的一点小想法,归根结底还是要请读者认可的。

《北史》在《隋宗室诸王传》中,引述了慎子的这样一段话:“一兔走街,百人逐之;积兔于市,过者不顾。”不是不要那些市场中的兔子,是因为那些兔子已经有了归属,而在大街上奔跑的兔子,由于没有归属,即便只有一只,人们也要蜂拥追赶,希图占为己有。然而细想想,捉不到又怎样?当然不会怎样。想通了,跟着兔子一阵疯跑,出一身透汗,不也是一件好事?搞研究也类似于此,只要在疯跑之中得到某种释放,也就就可以了,因为至少我们在释放中获得了某种愉悦,还有什么不高兴呢?